

文化還原中的生命自覺與民族自信

——關於楊義先生的學術方法和 《深入文明史的中國思想史》的閱讀筆記

王巨川¹

縱觀楊義先生四十餘年的治學之路，“返回中國原點，參照西方理論，貫通古今文獻，融合以期創新”²，由此創建了多個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新觀念和新方法，諸如“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大文學觀”、“中國敘事學”、“中國文學地理學”、“文化還原”、“邊緣活力”等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為中國學術聖殿鑄造了一個又一個高峰，成為當代學術史中不可複製的“連峰現象”。

基於此，我們可以用黑格爾哲學的“圓圈”概念，理解楊義先生畢生的螺旋上升式的自組織構建規律，即在大文化觀的視野中對研究對象進行本體性歷史還原的路徑，由此，先生的“文化還原”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是其自成起結的學術“圓圈”，通過這一路徑，其呈現的規律是在治學理念（絕對理念）的統攝下由多個研究對象（邏輯環節）共同組成並無限接近真理的曲線構成。在黑格爾看來，絕對理念是由許多邏輯規定組成的具體概念，其中各個環節之間保持着一種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繫，每個環節又同時以其他環節及其互動關係不斷充實自身的內容。黑格爾的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與楊義先生的研究路徑有着某種相似或互證。

¹ 王巨川：北京體育大學熱文學院副研究員。

² 楊義：《中國敘事學·後記》，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眾所周知，中國文化原點與西方現代理論之間是存在着距離的，距離的存在，就騰出了文化對話和學理原創的空間。“文化還原”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不僅為中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多維、動態的學術路徑，而且對建構當代人文科學與文化思想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從《魯迅文化血脈還原》到《深入文明史的中國思想史》，是楊義先生在文化還原的“圓圈”學術集大成的路徑，其中的核心內涵，是將作家的血脈與文學的文化研究整合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和思想史脈絡中。其目標也如楊義先生指出的：“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本，既是我們民族這艘大船的精神動力，又是這艘大船快速航行的壓載之物，這種文化根本的雙重功能，使我們民族的大船能夠贏得穩重中的高速，高速中的穩重。”這個判斷的深刻性與透徹性自然不必多說，這是先生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遞交的一份滿意“答卷”，也是他身體力行地由“跡”尋“魂”的學術根基之所在。

從先生著述的整體脈絡來看，其中的“跡”是在文學史中生長起來的一粒粒穗芽，而先生追尋的“魂”正是由這些穗芽彙聚起來的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民族文化。從現世流動性存在的人文地理環境中“取”，再到回溯歷史傳統文化多層次的“複”，楊義先生的研究不斷地深入並探求到魯迅的生命肌理與文化血脈之中，在大歷史觀的範疇中提出了追問式命題：“魯迅是誰？他從何而來，向何而去？”他由此回到魯迅與先秦諸子、魏晉文章、宋元野史、明清小說、左聯文學的一系列文化足跡之中，回到魯迅與漢畫象和由宋及清的金石學之關係中，回到對魯迅的小說、散文、雜文、詩的逐一體驗和評點之中。這種追問不以斷代論魯迅，不以簡單的尋章摘句論魯迅，而是強調魯迅作為文化巨人的主體性的總體史。

事實上，先生一直以來的學術研究致力於在紛繁浩瀚的文化海洋中“溯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在不斷考證民族文化生命自覺和文明話語自信的過程中，也最終凝聚起先生終生的學術追求——探尋中華文化根本，感悟中華文明智慧，匯通中華思想奧秘——樹立大國形象並為之尋找與世界對話的“身份證”。可以說，先生對中華民族文化本源的追問和思想歷史的重構，對處於世界百年之大變格局中的我們樹立文化自信與建構大國形象有着重要的意義。

早在四十年前，當先生以一己之力完成 150 餘萬字的《現代小說史》三卷本的時候，授業恩師唐弢先生就曾對其“筆路藍縷，獨闢蹊徑”的文學史創建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是“從實際出發，從具體材料出發，由作品而及於作家全人，由作家個人的風格而及於他所屬的流派，又由紛繁複雜的風格流派中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根據總的現象試作判斷，梳理出這些現象的歷史脈絡與發展規律……既有微觀的分析，也有宏觀的總體的把握”。彼時旅美學者夏志清先生也稱先生為新一代“治小說史、文學史第一人”，多年之後他又欣慰地說：“歷史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並同時預言楊義必定會是“一代通人”。現在看來，夏志清先生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有預見性的。因為此後先生的學術道路越走越寬、越走越遠，從文學史踱步於文化史、徜徉於文明史和思想史之間，先生在中西文化潮頭和思想前沿的碰撞與匯通中不斷地讓自己的學術“圓圈”孕育出新的生命活力，增加着無限的歷史高度，以自己獨特的方法論鑄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學術高峰——中國敘事學、中國文學地理學、中國詩學以及先秦諸子還原，成為先生“圓圈”中一座座無法逾越的理論聖殿，而這種持續的“連峰現象”不僅成為學界的“楊

義現象”，也終究使先生成為現代中國學術的“一代通人”。

當楊義先生立意“探源溯流，為現代小說的發展探尋它的源頭”而“獨行逆襲”的時候，或許他已經意識到自己之後會立於中華民族文化思想的潮頭而上下求索。憑藉自己對學術的敏銳感知和睿智思維，先生從現代魯迅的文化精神中敏銳地感知到民族文化的傳承，又在李杜詩學、楚辭漢賦、先秦諸子的精神世界與文化海洋中尋找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本。在先生思考中國敘事學與西方理論的差異時曾說：“作為中國數千年非常輝煌而獨特的敘事遺產的繼承者，我們似乎不應該滿足於給西方的敘事理論提供一點例證，而應該走着一條哪怕是艱難的道路，也要境界獨辟，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敘事理論體系，去豐富人類在此領域的智慧。”此中態度，可以代表先生持之以恆的學術思想和生命追求，這是先生在為我們民族自己的文學、文化尋找“說話”的方式，因為祇有學會了理性地“說話”，才有可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才會明白地展現自己的文化。

楊義先生曾說，理論之道有兩條，一條簡捷，一條艱難。但是，縱觀先生四十餘年的學術成就，及其在數十種著作中闡發的學術思想，我們絕對不能以“簡捷”或“艱難”來界定先生的學術意義。這是因為，在許多研究者看來的“艱難”，對於先生而言卻是一條“簡捷”之路，這無疑是基於他對中國文化的熟識和體認、對西方思想的吸納和熔煉，這種功夫自然非常人所能。特別是在集大成之作的《深入文明史的中國思想史》中更是如此，正如有學者指出楊義先生的學術思想“一方面與西方哲人的本體論解釋學有方法論原則和目標的同構性……一方面又鮮明地體現了中國思維的本質特徵。”應該說，這是一種既有中國理論特色又可以與西方話語體系對峙互補的學術

風範。所以，先生才會自信地指出中華民族文化的超越性價值和永恆性意義，也正是如此才支撐起先生的生命自覺與民族自信，他說：“五千年一脈相承、在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明朝萬曆年間，也就是西方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歷史文化典籍相當於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中華文明處在世界文明的領先位置。所以愛國，重要的標誌是愛中華文化的根本。”

從代表性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開始，到文化溯源的“先秦諸子還原”，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思想脈絡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在這個過程中，先生在其獨有的由“跡”尋“魂”的方法論引導着他的學術實踐，比如在考察諸子的時候，他說：“通解諸子的民族、部族、家族，通解諸子的思想及生命體驗，與他們的生存形態的原初關聯。祇有這種原原本本的研究，才能夠觸摸到諸子的體溫，感受到他們思想發生的真實過程，為我們民族的文化生命刷新它最初的思想根系。”然而這個過程並不簡單，需要有推求原始、鑿開混沌、進入現場的勇氣，需要調動和整合人文地理學、歷史編年學、史源學、文獻學、簡帛學、考據學等學術功底。比如在第二編中，先生猶若考古學一樣，將研究對象視為出土的陶罐殘片，按其形狀、紋飾、弧度、斷口等諸要素進行縝密的粘接，殘缺部位補配以石膏等材料，復原出古陶罐的全型，審慎而客觀地重建文化歷史的現場，恢復原本的文化生命狀態。“與先秦諸子進行深度的文化對話，追問他們為我們民族注入何種智慧，他們在創立思想時有何種喜怒憂愁，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中他們提供的思想智慧有何種是非得失，在現代大國文化建設上這些古老的思想智慧如何革新重生。”

“文化還原”的學術方法並非是橫空出世、自說自話的學術噱頭，而是

與楊義先生四十餘年的學術積累、學術經驗和學術思考息息相關、一脈相承。誠如先生在原創中國多維詩學時所指出的那樣：“以文化為外在語境，以生命意識為內在脈絡，李杜詩學研究過程，實際上是研究者以生命感悟與千古詩人的生命表達訂立精神契約的過程。”¹在“文化還原”的方法論中，楊義先生切身地把生命的感悟參透於中國千古血脈之中，通過“文化-生命-感悟-還原”的多維考辯，以時間/空間、歷史/文本作人文研究的始基點，從中國思想文化起點的先秦諸子再到現代文化先驅的魯迅，為中國人文科學研究“開闢一個新的思路和新的境界”²。他在談到魯迅的人格問題時說：“魯迅的人格美自然首先是根源於他所處的時代，他所走過的生活道路，他所吮吸的農民階級的‘野獸的奶汁’，他所接受的世界進步思潮的影響……同時，這種人格美又和我國歷史上一批優秀作家的高尚人格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在《浙東學派與紹興師爺》一章中說：“魯迅對會稽的風土名物、先賢的行狀遺作都有着濃烈的興趣，作為一代文豪，他的人格、文章的成長不能不與這個‘古稱沃衍，珍寶所聚，海嶽精液，善生俊異’，‘禹勾踐之遺跡故在’的地方緊密相連”，再加上會稽乃魏晉風度的發源地，由此明確指出“紹興是魯迅的人格故鄉”。³同時，這種文化還原又是以“通脈啟新立風範”的大智慧為根本的，他“在魯迅研究中尋索現代啓示，以博大開放的視野疏通文化血脈和開啟生命新機，使魯迅之學成為中國總體文化精神的一個有機、強勁又充滿活力的流脈，從而建立現代大國的文化風範。”⁴這

¹ 楊義：《李杜詩學的當代價值》，《中國文化報》2001年8月2日。

² 楊義、趙稀方：《楊義訪談錄》，《東南學術》2003年第1期，第23—41頁。

³ 楊義：《魯迅文化血脈還原》，第63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⁴ 楊義：《魯迅文化血脈還原》，第292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就是楊義先生一生為之努力的治學、治史的獨特魅力和智慧所在。

因此，文化還原的關鍵，是將古老的文本當作古人的生命痕跡來對待，對經典的內在脈絡進行生命分析。因而對文化還原不能祇做單一學科的整理與闡釋，更重要的是打通文史哲，跨越地理、民族的區隔，達到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合同用力，推求原始，折中百家，達到本質還原、生命還原。楊義先生突破百年魯迅研究既定的視野偏至和思維禁錮，在《魯迅諸子觀的複合形態還原》認為：“分析‘五四’，離不開分析先秦，唯此才能進入文化血脈的認同、超越和重造的深處。”而“魯迅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的前驅人物，他與作為中國思想文化之根本的先秦諸子的關係，牽動着中國文化之現代性轉型的靈敏的感應神經。”¹從這個路徑上可以看到，楊義先生從《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起步，為了尋找現代小說的文化源頭，又溯源至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之後的中國敘事學、生命詩學、諸子還原以及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大文學觀等概念的提出，無不是先生在為現代中國尋找與世界對話的中華文明的本真形態。

這些都可以在本書的內容中獲得明確的答案。比如，在第三編中討論的“生命詩學”，先生從司馬遷如何撰寫《史記》，再到魏晉的陶淵明、唐代的李杜、宋代的蘇東坡等一系列具有“文化典範”和時代氣質的人物研究。先生認為，陶淵明“把生命的存在分為形、影、神三種形態，使之相互對話，表達着各自的欲望、追求和境界，在駁難、質疑和解釋中把對生命的理解推向新的層次。奇特的想像，展示了對生命的關懷、困惑和省悟，是人的覺醒這個時代母題的詩的表達。”在中國歷史上，對生命本身的關注是中國

¹ 楊義：《魯迅文化血脈還原》，第209—210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文化思維的巨大進步，也是中華民族文明體系初步建構的開始，而將這一生生命意識轉為詩學思維的巔峰表達則是唐詩，“唐詩作為一部精神文化史，以及借助強盛的國力和眾多的人才而崛起的藝術高峰，使得我們對它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典型個案的‘高峰分析’。李白、杜甫作為高峰中的高峰，對他們的研究，因而也就成了‘雙重高峰分析’的典型。”至此，獨具中國精神氣質的“生命詩學”，便自然而然地成為楊義先生在文化發生學的研究視野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不論是動態的生命演進，還是靜態的生命呈現，都在發生學和解釋學中予以學理性和反思性的論證分析。再如，先生從蘇東坡入手討論“士”人文化，認為“蘇東坡已經成了一種文化，他以文學上的曠世大才，代表着一種以才情浩蕩，詩、文、詞、書、畫兼通，而又意趣曠達為標誌的士人文化形態。”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階層是歷史演進過程中的文化創造者和傳承者，而“士”人文化則是在蘇東坡一代才真正完成了從特殊到普遍的超越，並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化體系，其中隱含着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思維形態和生命結構信息，同時，它的超越時代和解釋能力也代表着中華民族文化歷史積澱的認識高度。

在《深入文明史的中國思想史》中，讀者不難管窺到楊義先生學術思想的全面性和研究視點的多樣性。正如他在書中所言：“作為一國‘公產’的中華民族文化，以深厚博大的內涵為根基，具有強大的包容力和統合力，它能夠包容和統合眾多的部族、民族於同一個文化共同體之中。”“文化的共同體”也正是中華文化持久不衰、文明充滿活力的顯著特徵之一。因此，先生自豪地說：“中華文明是一個複合的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創造的多元共構的一種文明，這個文明形態的原創力、兼容力和傳承能力在世界上都是第一

流的。”其中的民間社會文化形態與多民族共存共生的“邊緣活力”，同樣參與着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建構，由此生成的文明形態自然是世界一流的。在這樣的一種充滿民族自信的認知中，他才能強調對於民間文化中的眾多文學文本應該“從中國文化精神的角度，從中國文明史的內在脈絡的角度”去研究，因為它們是“反映中國民間精神文化的一種史詩性作品”，而且“是民間智慧和下層文人智慧融合成的一個文明史結晶”。

楊義先生在著作中通過氣勢恢宏的會通整合與豐富扎實的文本材料的結合，建構起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史的系統路徑，所取得的成就雖然不能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語定讞，但作為中國當代學術的一座高峰必然是毫無爭議的。在當代學者中，能夠把個人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轉化為影響民族文化精神的自然不多，而楊義先生當列其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強調說，對於這麼一份堪稱世界一流的文化遺產，如果中國學者不把它的深層智慧充分闡發出來，並以自身的現代性跟世界現代文化接軌，那是中國學者沒有盡到責任。